

王荣奎 老根 主编

周易

天下第一奇书

宝典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天下第一奇书——

《周易宝典》

王荣奎 老 根 杨 洪 刘 屿 主编

卷 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周易宝典》总目录

卷 一

第一编 潜龙勿用

——《周易》与传统文化总论

第一章	中华文明之渊藪，人类文化之华章	(3)
第二章	生命之树——《周易》与传统文化之和同	(66)
第三章	海纳百川——《周易》与儒释道诸家	(97)
第四章	自强宽容——《周易》与中华民族精神	(119)
第五章	整体直觉——《周易》与中国思维方式	(133)
第六章	文化之源——《周易》与古代社会科学	(166)
第七章	科技之光——《周易》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	(205)
第八章	指点江山——《周易》与中国古代生活	(232)

第二编 见龙在田

——周易经传全貌纵览

第一章	通天之经，传世之典	(259)
第二章	周易上经	(267)
第三章	周易下经	(440)
第四章	系辞上传	(616)
第五章	系辞下传	(654)
第六章	说卦	(689)
第七章	序卦	(708)
第八章	杂卦	(724)
第九章	帛书周易	(731)

卷 二

第三编 终日乾乾

——纵论易学之发展传承

第一章	恢宏博大之象，千载传承之脉	(749)
第二章	极尽滥觞之汉代易学	(779)
第三章	作为过渡之晋唐易学	(914)
第四章	新义迭呈的宋代易学	(995)
第五章	转化趋密的元明易学	(1314)
第六章	作为总结的清代易学	(1451)
第七章	推陈出新的近代易学	(1628)
第八章	夏莠杂陈的台湾易学	(1652)
第九章	《周易》东传与东亚易学	(1672)
第十章	《周易》西传与易学国际化	(1705)

卷 三

第四编 或跃在渊

——《周易》与中华预测学探秘

第一章	卜筮源流——《周易》预测学发展史略	(1733)
第二章	神龟天降——从《龟策列传》到《灵棋经》	(1815)
第三章	奇门遁甲——《奇门遁甲》与《奇门法窍》	(1865)
第四章	六壬大法——《秘藏大六壬大全》	(2039)
第五章	邵雍神算——从《梅花易数》到《一撮金》	(2276)
第六章	天赐纳甲——从《火珠林》到《纳甲筮法》	(2809)

卷 四

第五编 飞龙在天

——略论《周易》神妙无方之应用

第一章	易学与经营管理	(3021)
第二章	六十四卦与人生智慧	(3178)
第三章	易学与风水	(3357)
第四章	易学与科技	(3461)
第五章	易学与兵法	(3581)
第六章	医易会通——《周易》与中华传统医学	(3660)



目 录

第三编 终日乾乾

——纵论易学之发展传承

第一章 恢宏博大之象，千载传承之脉·····	(749)
第二章 极尽滥觞之汉代易学·····	(779)
第一节 汉易分流——象数与义理·····	(781)
一、《周易》的象数内涵·····	(783)
二、《周易》的义理内涵·····	(789)
第二节 开山鼻祖——《子夏易传》·····	(793)
一、《子夏易传》考辨·····	(793)
二、子夏诸说·····	(800)
三、《子夏易传》对后世易学的深远影响·····	(805)
第三节 卦演天时——孟喜、京房之卦气说·····	(815)
一、卦气略论·····	(815)
二、孟喜说“卦气”·····	(820)
三、京房与《京氏易传》·····	(826)
四、卦气学在易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840)
第四节 趋入神秘——《易纬》之神秘哲学·····	(844)
一、《韩菑度》之深义·····	(847)
二、《易纬》他说·····	(861)
第五节 乾坤再造——东汉易学发展与翻新·····	(865)
一、五行说——郑玄易学·····	(866)
二、乾升坤降说——荀爽易学·····	(869)
三、卦变说——虞翻易学·····	(873)
四、《参同契》——魏伯阳易学·····	(877)
第六节 开天辟地——汉代易学之成就·····	(890)
一、占筮术的变革创新·····	(891)
二、爻振说与升降说·····	(900)
三、卦变、爻变学说的发展·····	(902)
四、用象方式的衍扩·····	(906)
第三章 作为过渡之晋唐易学·····	(914)
第一节 无为神氏——玄学解易·····	(914)

一、《周易注》与《周易略例》	(914)
二、清和有思理的《系辞注》	(942)
第二节 扫象阐理——玄学之建树与意义	(951)
一、《周易》体制及阐理方式的改变	(951)
二、得意忘象与阐理捷径	(955)
三、推行条例与弘深易理	(960)
第三节 兼容并蓄——易学与盛唐文明	(965)
一、拓展义理的《周易正义》	(966)
二、象数余绪之《周易集解》	(986)
三、以无为本，通变适时	(989)
第四章 新义迭呈的宋代易学	(995)
第一节 图书之学——陈抟、刘牧、周敦颐之象数论	(997)
一、陈抟的华山象数	(998)
二、刘牧的河洛之学	(1004)
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1015)
第二节 古易质疑——李颙、欧阳修、司马光之易学	(1028)
一、注重义理的李颙易学	(1029)
二、重人事而轻天道的欧阳修易学	(1037)
三、司马光与《温公图说》	(1045)
第三节 逍遥旷达——特立独行的《东坡易传》	(1053)
一、自然之理与人事之功	(1056)
二、卦爻结构与义理内涵	(1067)
三、苏轼的文化价值理想	(1078)
第四节 太虚御气——张载气学派	(1085)
一、为天地立心	(1092)
二、为生民立命	(1105)
三、为万世开太平	(1118)
第五节 先天后天——邵雍数学派	(1130)
一、宇宙图示与先天之学	(1140)
二、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	(1150)
三、人文情怀与宇宙意识	(1161)
第六节 理学根本——程朱理学派	(1169)
一、程颐的易学	(1172)
二、朱熹的易学	(1215)
第七节 心学解易——程颢、陆九渊、极简之易学	(1262)
一、存心明理的程颢、陆九渊易学观	(1262)
二、心性说易的杨简《易传》	(1275)
第八节 功利易学——薛季富、叶适易学	(1285)
一、体用一源的薛季宣易学	(1287)

二、道不离器的叶适易学	(1292)
第五章 转化趋密的元明易学	(1314)
第一节 理在气中——薛瑄、罗钦顺理学向气学的转化	(1315)
一、濂洛为鹄的薛瑄易学	(1317)
二、潜玩精思的罗钦顺易学	(1330)
三、扬太极元气说的王廷相易学	(1344)
第二节 万法归心——湛若水、王畿、心学派	(1360)
一、理气心性合一说	(1362)
二、致良知说	(1372)
第三节 象学之巅——来知德、方以智象数论	(1388)
一、来知德易学	(1390)
二、方以智易学	(1410)
第六章 作为总结的清代易学	(1451)
第一节 点评宋明——王夫之《周易内传》和《周易外传》	(1452)
一、论《周易》经传	(1456)
二、易学中的气本论	(1503)
第二节 图书批评——黄氏兄弟、毛奇龄易学	(1569)
一、《易数象数论》和《图学辩惑》	(1570)
二、《仲氏易》	(1583)
第三节 汉易复兴——惠栋、焦循易学	(1591)
一、《周易述》和《易汉学》	(1592)
二、焦循对汉易的阐发	(1596)
第四节 正本清源——象数义理定评	(1619)
一、象数学与义理学发展的历史趋势	(1620)
二、象数与义理定评	(1622)
第七章 推陈出新的近代易学	(1628)
第一节 古史之辩——郭沫若、顾颉刚、李镜池易学	(1630)
一、郭沫若论《周易》	(1630)
二、顾颉刚论《周易》	(1631)
三、李镜池论《周易》	(1634)
第二节 乾坤之衍——熊十力、闻一多、胡朴安易学	(1636)
一、熊十力论《周易》	(1636)
二、闻一多论《周易》	(1640)
三、胡朴安论《周易》	(1642)
第三节 科学之易——冯友兰、薛学潜、刘子华易学	(1644)
一、冯友兰论《周易》	(1644)
二、薛学潜论《周易》	(1646)
三、刘子华论《周易》	(1649)
第八章 良莠杂陈的台湾易学	(1652)

第一节 循序渐进——台湾易学的分期及演进	(1652)
一、易学复兴的萌芽	(1653)
二、易学复兴的初步阶段	(1654)
三、易学发展的巅峰	(1656)
第二节 百舸争流——台湾易学流派考究	(1659)
一、易学考据派	(1660)
二、易学史学派	(1661)
三、易学哲学派	(1661)
四、易学科学派	(1662)
五、易学宗教派	(1665)
第三节 比翼双飞——两岸易学发展比较	(1666)
一、易学在大陆的发展状况	(1667)
二、易学在台湾的发展状况	(1669)
三、《周易》与中国哲学	(1670)
第九章 《周易》东传与东亚易学	(1672)
第一节 太极图与国旗——朝鲜易学的发展状况	(1673)
一、古史传说与《周易》	(1674)
二、政教分离与易学发展	(1676)
三、易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678)
四、程朱理学传入朝鲜	(1683)
五、二十世纪朝鲜易学的演进	(1687)
第二节 官方教材与《周易》——日本易学发展概况	(1688)
一、《日本书记》与《周易》	(1688)
二、日本传统易学的形成与发展	(1691)
三、日本易学的发展高峰	(1696)
第十章 《周易》西传与易学国际化	(1705)
第一节 文化交汇——《周易》传入西方	(1706)
第二节 激越澎湃——西方易学发展史略	(1714)
第三节 文化使者——易学国际化的意义	(1722)
一、文化传播学与《周易》	(1722)
二、经典文本与文化传播	(1723)
三、《周易》国际传播史的综合性	(1727)

第一章 恢宏博大之象，千载传承之脉

乾者，健也。乾乾，前进不倦也。《易经》作为六经之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刚健之精神蔚为易学的传统。易学一脉朝朝有新义，代代有大家，是中国文化慧命绵延不绝之动力本源。

在西周前期，《周易》一书由天子的卜筮之官世守着。由于这门学问由专人掌管，因此，一般人是无缘接触的。

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状态好像依然没有改变。最明显的证据是《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民《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像韩宣子那样的人，也只有到了鲁国，才能在“太史氏”那里见到《易象》，可知这书，连晋侯那里都没有，一般人更是见不到了。再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云“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可能陈侯亦无此书。

然而，对于《周易》的研究，早在春秋时代，或者更早，恐怕就已有像《说卦》般专谈卦象的著作。否则，《左传》《国语》所记二十几条筮例，其年代不同，各有别，而所讲的八卦之象，何以会如此一致？而且，可能也有了类似《彖》《象》《文言》阐释卦义的专著。因为，由《左传·襄以九年》所记穆姜对“元亨利贞”四字的解释看，它与《左传》《国语》其它筮例对此的解释，多有雷同之处。（详见《‘左传’‘国语’筮例》）同时，《左传·闵公元年》筮例中所言“屯，固；比，入”和“坤，安；震，杀”等，文字简约，皆以一字断卦义，很可能出自当时阐述卦义的专著。

至战国时代，《周易》的传播范围已有所扩大。——但它流入民间，起码已是春秋末期的事了。——为《周易》经文作传的《彖》《象》《文言》《系辞》等，已在这时写成，因前面已有专文讨论《易大传》的问题，此处即不详述了。这时的读书人，如庄子已说出了“《易》以道阴阳”的话（见《庄子·天下篇》）。荀子则开始引用《周易》经文与发挥传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非相篇》《大略篇》等），但这时《周易》的学术地位仍然不高。当时一般读书人要学的是《诗》《书》《礼》《乐》，《周易》尚不在其列——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秦统一天下因为当秦始皇焚书时，被当时儒生所推崇的“圣贤之书”尽皆被毁，“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书·艺文志》语）。

这就是说，《周易》在秦统一天下后，仍属“筮卜之事”，没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它才逃过了那场秦火。

到了西汉，《周易》却凌驾《诗》《书》《礼》《乐》《春秋》之上，成为“六经之首”。

班固誉之谓“大道之原”，而扬雄也说：“六经之大莫如《易》。”于是乎平步青云，为《周易》六十四卦作传注的《彖》《象》《文言》《系辞》等，也被列入经文了。

西汉人为什么把《周易》抬到如此高的位置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谈谈孔子和《周易》的关系。

根据传统说法，被后人称谓“十翼”的《彖·上》、《彖·下》、《象·上》、《象·下》、

《文言》、《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十篇解释《周易》古经的文字，系孔子所作。这种说法源于《史记》与《汉书》，如《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那么，这所谓“十翼”是否出于孔子之手？

这个问题首先被宋人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提出来了。

他认为自《系辞》、《文言》、《说卦》而下，都不是孔子所作。根据是：“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

欧阳修不仅从文字上发现《系辞》、《文言》、《说卦》而下不像孔子手笔，从内容上也发现种种矛盾之处：“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又据《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鸡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及至《说卦》却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这样“八卦”共有三出。于是欧阳修说：“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

他还从《文言》、《系辞》等行文的口气上看出了问题：“‘何谓’‘子曰’，讲师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

但欧阳修仍相信《彖》《象》为孔子所作。

接着，宋人赵汝楳在其《周易辑闻》中也疑《说卦》《序卦》《杂卦》是由汉儒窜入，《系辞》多称“子曰”，亦为门人所述，不是孔子之笔。

元人王申子在《大易辑说》中亦斥《序卦》非孔子之言。清人崔述于《洙泗考信录》中以结实的证据，证明《象》中有的话系引用曾子之言，进一步断定《彖》《象》亦非孔子所作，“必曾子以后之人之所为”。

宋、元及清人的这些见解，引起了后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特别是经过今人多方面的探讨，考证，基本上已经推翻了古人关于“十翼”为孔子所作的传统说法。

那么，《史记》《汉书》都说孔子为《周易》作“传”，这会不会是无稽之谈？

我们认为还不是。因为孔子离汉初不过二百多年的时间，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对史料认真负责的人，绝不会凭空编造，他们一定言之有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汉书·儒林传》中曾详细列出了孔子传《易》的师承关系名单，从这两张名单上看，其中虽稍有不同，但他们师承授受，都是传至当时的西汉人田何。汉人最重师承关系，如无一定根据，班固等怎能编造？

我们想，孔子是鲁国人，又在鲁国做过官，也一定见到过韩宣子在鲁国所见的“《易》象与鲁《春秋》”，尤其这“《易象》与鲁《春秋》”是体现周礼的书，孔子怎会不看？故《汉书·儒林传》说孔子“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很清楚，孔子做《春秋》，自与鲁《春秋》有极密切的关系。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也不会是妄说。如《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正是“晚而好《易》”的证据。同时，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曾引用过《周易》之《恒》卦九三爻辞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并说：“不占而已矣！”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孔子是研究过《周易》的。而“不占而已矣！”也正可以说明孔子曾经：“占”过。

像孔子这样的人，特别是到了晚年，在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之后，潜心于《周易》“而为之传”，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故《史记》、《汉书》说孔子为《周易》作传，一定是言之有据的事实。如前所述，由《左传》《国语》筮例考之，起码在春秋时代，对《周易》的卦象就有了统一的解释。对卦义与卦爻之辞，可能也有了注解与说明。孔子只是像删《诗》一样，对此进行了整理。一向主张“述而不作”的孔子，对这些古人《易》注，可能也作过口头阐释，故《史记·孔子世家》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这话大概是有根据的。

关于这一公案，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孔子在前人说《易》的基础上，曾经对《周易》作过一些口头阐释，他的弟子及后人把这些阐释记录下来，并加工补充，到战国初期至中期，形成了《彖》《象》《文言》《系辞》的主要篇章。这些篇章反映了孔子思想，但却是后人托孔子之名而作。

作为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动，西汉人又把儒家捧了起来，特别到了武帝时，儒家已处于独尊的地位。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易》在其内。汉初之人想必都知道孔子为《易》作注的事，圣人既然为《周易》作过传注，《周易》的学术地位也就假孔子而益高了。恐怕这就是《周易》到了汉朝，一跃而为六经之首的根本原因所在。

经过一场秦火，西汉初年“天下但有《易》卜，未有它书”（见《汉书·刘歆传》），直到孝惠帝时，才去掉禁止民间藏书的命令，《书》、《诗》、《礼》、《春秋》等书，渐渐与世人见面。而汉初传《易》之人，本于田何一家：《汉书·艺文志》：“汉兴，田何传之。”《汉书·儒林传》：“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后来汉《易》逐渐成三家：除田氏《易》外，又有梁人焦延寿以《易》言灾异，另有费直出古文《易》传人。到了班固作《汉书》时，《易》已有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而田何《易》传丁宽等四人，丁宽传田王孙，田王孙传施仇、孟喜、梁丘贺。田氏《易》，传至施、孟、梁丘无非四传，但据《汉书·楚元王传》刘歆说：“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可见到宣帝时，《梁丘易》已与施、孟之《易》“义虽相反”，不一样了。

一家之《易》何以会如此呢？

这是因为《周易》之学在西汉突起之后，特别到了宣帝，元帝年间，能通一经的人不但可以免去徭赋，还可以做官，像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等，曾以治《易》当了大官。

于是有些人把治《易》当作晋身之阶，纷纷传习，持论也多自标新立异起来。《汉书·儒林传》中讲到蜀人赵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还说孟喜改师法，“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由此可知，西汉初年，《周易》经文已开始受到人们的曲解，故后人多以为汉《易》可信，其实，汉初即有人“持论巧慧”“改师法”了。

但总的说来，西汉人还是重视经义的，更加那时离《周易》形成的年代不远，故《周易》卦爻辞的本义，当时还未全部失传。特别是施、孟、梁丘三家所传《周易》，因本于田何，故在西汉十三家中，占据极重要位置，被《汉书·艺文志》排在首位，对两汉儒生有过很大的影响。

因其书久已亡佚，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之《易》，只是散落于汉、

唐、宋诸书中的片言只语罢了。现略辑诸书所引者，以窥西汉古《易》之一斑。

宋人朱震在他的《汉上易传》中引《升》卦初六爻之“允升”曰：“施仇作‘鞅升’。”并说“鞅，进也”。这与《说文》及《汗简》俱引古《周易》作“鞅升”正相符。这个“鞅”字之用，恐怕就是施氏《易》说，至今所仅存于前人典籍中的材料了。

梁丘贺之《易》，其内容已于前人典籍中茫然无考。

孟喜《易》因唐代犹存，故其遗说仍可略考。又加汉人许慎《说文》中引孟氏《易》文较多，如“晋”字引孟《易》作“晉”；“巽”字作“𡙇”；“艮”字作“𡵓”等等。《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作“忼龙有悔”，“亢”字在此与“忼”字通，由此可证。而唐人唐元度之《九经字样》及宋人郭忠恕《汗简》亦曰“忼”，故今人有解“亢”字为“沆”字者，可证其不确。

其它如《噬嗑》卦九四爻“噬乾肺”引孟《易》作“噬乾肉”，《姤》卦之“系于金柅”，引孟《易》作“系于金橛”，《系辞》之“服牛乘马”引作“犗牛乘马”，“天地絪縕”引作“天地壹壹”。《说卦》之“叁天两地”引作“叁天网地”等等，异文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另外，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亦多引孟《易》古文。如《咸》卦上六爻“咸其辅，颊、舌”，引孟《易》作“咸其辅、侠、舌”，再如《丰》卦之《彖》中“日中则昃”，《释文》引孟《易》作“日中则稷”。案《左传·定公十五年》：“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公羊传》亦同，《谷梁传》却作“稷”字。可知春秋时代，“稷”“昃”字通用，由孟喜《易》文使用春秋时代通用字来看，我们把田何传本的相承关系追溯到春秋后期，还是可以立住足的。故《彖》可能写于战国初，而不会太晚。

据《经典释文·序录》说，施仇与梁丘贺之《易》，亡于永嘉之乱。《隋书·经籍志》亦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

独孟喜一家，由于虞翻五世家传孟氏《易》学，故能传至唐。但南北朝时已残缺不全，至唐失散更多，入宋，孟氏《易》亦全部亡佚。

据《汉书·艺文志》说，西汉之《易》，除施、孟、梁丘三家之外，另有京氏《易》亦列学官。据《汉书·儒林传》说，汉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之《易》皆祖田何，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京房，字君明，本姓李，吹律自定为京氏。受《易》于梁人焦延寿，其学以纳甲、八宫、世应、飞伏、五星四气等妄言灾异。由《汉书·艺文志》看，当时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至隋，京氏《易》尚存十种，七十三卷。入唐，就只有五种，二十三卷了。

汉人所引者，皆称“京房《易传》”，内容多言灾异之事。其中以《汉书·五行志》中徵引最多。而《经典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及《周易集解》（以下简称《集解》）中所引京氏《易》文，与汉人所引言灾异者完全不同。如京房于《复》卦卦辞“朋来无咎”一句，曰“崩来无咎”（见《释文》）《颐》卦初九爻中“观我朵颐”一句，《释文》引京氏《易》作“观我耑颐”《坎》卦初六爻之“习坎”一句，《释文》引京氏作“习斂”并云“斂，险也，陷也。”《集解》引京氏注《否》卦九五爻“系于苞桑”一句，曰：“桑有衣食人之功，圣人亦有天覆地载之德，故为喻。”注《无妄》卦曰：“大旱之年，万物皆死，无所复望。”《释文》引京氏注《系辞》之“鼓之以雷霆”一句，曰：“霆者，雷之余气，挺生万物也。”其解皆独俱创见，可惜《释文》、《集解》所存京氏遗文不多，加在一起不过五十几条，故从这些片言只语中，已

难窥京氏《易》文全貌了。

当时降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外，民间又有费、高二家之说。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所谓“费氏经”，即费直所传《易经》。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他所传之《易》，在西汉未列学官，是在野派。据《汉书·儒林传》说，费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

其实，据我们初步考证，费氏传《易》亦取象数，故《汉书·儒林传》的说法，可能并不全面，关于这点，下面还要谈及。

费氏所传《易》本，与施、孟、梁丘的今文《周易》不同。据《隋书·经籍志》：“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案汉时，经学有今文学与古文学之分。在《易》学方面，费氏所传，为古文《易》，施、孟、梁丘、京氏所传，为今文《易》。

费氏所传古文《易》，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后来，经文上今、古文门户之争加剧，费氏古文《易》才应运而起，并被流传下来，下面还要讲到。

对《周易》经文与传文的注释，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资料是西汉人的。因此，西汉《易》学在中国《易》学史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孟氏《易》与京氏《易》，对后世影响最大。因孟《易》本于田何，而田何又是汉初唯一的传《易》者，因而孟氏《易》文被后人看作西汉古《易》正宗，又加一直流传至唐，因此造成了很大影响。至于京氏，以其飞伏，纳甲等占筮之术，被后人广为流传，也造成了深远影响。

到了东汉，谶纬迷信盛行，著书的多谶文强合经文。虽然还有过张兴讲梁丘《易》，弟子达万人的盛况（见《后汉书·儒林列传·张兴传》）。但在西汉盛极一时的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总的说来在东汉已经衰落。只有费氏《易》由马融作传，郑玄作注，荀爽又作传，故费氏《易》在东汉多有传授。

比较系统的汉《易》，经过清人辑录，今天只有东汉郑玄、荀爽、虞翻三家较为完备可观。郑玄、荀爽之《易》本于费直，虞翻本于孟喜。

作为汉《易》代表，我们介绍一下郑玄、荀爽及虞翻。

据《后汉书·郑玄传》说，早时郑玄遍注诸经，凡百余万言。他注经的特点是兼采今古文之长，注《易》虽用费氏古文《易》，但亦采今文。郑玄注《易》，除以互卦（见《关于〈易〉象》）消息（见《关于卦变》）推求卦象外，又用“爻辰”之说。

所谓“爻辰”，系指以《乾》《坤》两卦十二爻当二十辰，又以此十二辰分主十二月。即：《乾》卦初九爻当“子”，为十一月；九二爻当“寅”，为正月；九三爻当“辰”，为三月；九四爻当“午”，为五月；九五爻当“申”为七月；上九爻当“戌”，为九月。

《坤》卦初六爻当“未”，为六月；六二爻当“酉”，为八月；六三爻当“亥”，为十月；六四爻当“丑”，为十二月；六五爻当“卯”，为二月；上六爻当“巳”，为四月。

用此十二辰、二十八星宿及四方五行，卦气、十二属象等相值，解释着卦爻辞的由来。

下据张惠言《周易郑氏注》，浅析郑《易》之旨。

如郑玄注《泰》卦六五爻“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曰：“五爻辰在卯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贵仲春之月。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礼，福祿大吉。”意思是说，按“爻辰”法，《泰》卦六五爻当“卯”，为二月，正值春天。春天是万物生育的季节，故“仲春”之

月嫁娶，最为吉利，因而爻辞有“以祉元吉”。

以上是以十二辰所主十二月解释卦爻辞的“凶”“吉”。另有以十二辰所主属象解卦者。如《坎》卦上六爻辞中“系用徽纆”一句，郑玄注曰：“爻辰在巳，巳为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意思是说，《坎》卦的上六爻在十二辰中当“巳”，“巳”于十二属象为“蛇”，郑玄认为这一爻之所以称“徽纆”，是因为蛇“蟠屈似徽纆”的缘故。

再如《明夷》卦六二爻辞之“明夷，夷于左股”一句，郑玄注谓“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意思是说，按“爻辰”法，此卦六二爻当“酉”，“酉”为金，金在西方，故曰“酉在西方”——此为以爻辰与四方五行结合而解卦的例子。

然而，用“爻辰”与天文星象相结合，以解释卦爻辞，这是“爻辰”说的突出特点。而由郑玄注文看，有的卦是以星象的形状与“爻辰”结合以解释卦爻之辞。如《坎》卦六四爻辞“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郑注：“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贰，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意思是说，《坎》卦六四爻按“爻辰”法当在“丑”，“丑”上值二十八宿里的斗宿，斗宿六星有勺子的形象，故谓“可以斟之象”。斗宿上有建星，其形似“簋”，建星又有弁星如“缶”，郑玄认为正是此爻与以上诸星相值，故爻中有“簋”“缶”“纳约”等。而由注文的“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可证郑氏解“纳约”之“约”为“勺”，即酌酒之斗。《考工记》郑注也说“勺，故书或作约”可谓旁证。故今人于省吾先生解此爻“纳约”之“约”为“勺”（见《周易尚氏学序言》）正与郑氏此注相符。

还有的卦郑玄取星象名义以解释卦爻之辞。如《困》卦九二爻之“困于酒食”一句，郑氏注曰：“未上值天厨，酒食象。”意思是说，按“爻辰”法，此卦初爻值“未”，“未”上值“天厨”星，厨星盛酒食的，故有“酒食象”。再如注《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一句，郑玄说：“爻辰在未，上值东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意思是说，此爻上值东井星，星名中有“井”，人取井水用“缶”，故爻辞中有“盈缶”。

这样的例子在郑玄《易》注中还有，此处即不一一列举了。

因郑氏《易》注已经不全，特别是以“爻辰”法解《易》的材料，今存不过十几条。然而此法在汉人各家《易》注中，只有郑玄一家留存比较完整，故略述如上。然而其说颇多牵强附会之处，当然不可尽信。

前人多以为“爻辰”之法为郑玄一家所用，清儒甚至有说郑玄独创者，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以《乾》《坤》两卦十二爻与十二辰相值，又与十二月及五行配合，西汉人早已用之：《汉书·律历志·上》：“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六月，《坤》之初六……楙之于未……；正月，《乾》之九二，万物棣通，族于寅，木也；……”又说：“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阳六为吕……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始于子在十一月……位于丑，在十月……位于寅，在正月……位于卯，在二月……位于辰，在三月……位于巳，在四月……位于午，在五月……位于未，在六月……位于申，在七月……位于酉，在八月……位于戌，在九月……位于亥，在十月。”

可见西汉时，已有此说。

至于用“爻辰”与天上星宿相值，此法更不会是郑玄自造，若考其渊源，郑玄此说恐怕必有传授。我们知道，郑玄从马融学《易》，而马融即以天象注《易》文，如《经典释文》引马融注《彖》《无妄》之“天命不佑”一句，曰：“天不右行。”注《明夷》六二爻之“明夷，

夷于左股”一句，曰：“日随天左旋也。”《周易正义》孔疏引马融注《系辞》之“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曰“《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用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虽寥寥数条，但郑氏“爻辰”的天文星象，五行、十二月都有了。故郑氏“爻辰”之说，可能源于马融。而马融传费氏《易》，故其说可能自费氏来。费氏说《易》，即有以八卦与星宿、干支互相配合者。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费氏易林》《费氏分野》，其内容就是以八卦与干支相配合。所以，《汉书·儒林传》中称费直“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这种说法可能不够全面。况且，即称“解说”，必定既有所“解”，又有所“说”，怎能是直抄《彖》《象》《系辞》等十篇文字于六十四卦之后，而称“解说”呢？

再案《易纬·乾凿度》：“天地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调列，五纬顺轨。”亦可证起码在西汉时，已有“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调列”之说。又加当初《周易》由太史掌管，古太史兼管天文、历法。如《礼记·月令》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即其证。故这种以天象星宿解释《周易》的方法，估计起源较古，有可能是周太史的遗法之一。而由《系辞》之“仰以观于天文”“仰则观象于天”“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及从《彖》《贲》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等等话语看，《易大传》作者在正理前人遗说时，一定读到过古人以天象解《易》的资料。而考之《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其中又确实包含着不少天文观测的内容。如《丰》卦的卦爻辞，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对日全蚀的一次完整记录。再结合《说卦》之“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及《系辞》之“在天成象”的说法，我们认为，《周易》的阴阳爻画及其卦爻之辞，肯定吸收了当时天文观测的成果。

因此，郑氏这种以爻辰上值天象星宿以解《易》文的独特方式，其全貌虽然已难窥见，但凭流传至今的十几条例子，亦可见其一斑。所以，在《易》学研究中，汉人的这部分《易》学遗产，于启发我们探索《周易》本源方面，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实有进一步探讨、考证之必要。

东汉末年，另一个传贵直《易》的著名《易》学家为荀爽。

荀爽，字慈明。据《释文序录》记，唐时荀爽《易》注尚有十卷（《七录》称十一卷）后皆亡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易荀氏注》三卷。惠栋著《易汉学》，张惠言著《周易荀氏九家》，亦皆有辑录。

荀爽讲《易》，其特点是以阴阳二气的“升”“降”交通解释《周易》卦爻辞及《彖》《象》等《易大传》之文。如《周易集解》引荀爽讲《象》《乾》：“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曰：“气微位卑，虽有阳德，潜藏在下，故曰‘勿用’也。”讲《象》《泰》：“天地交，泰。”曰：“坤气上升以成天道，乾气天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气若时不交则为闭塞。今既相交乃通泰。”讲《象》《恒》：“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曰：“乾气下终，始复升上居四也。坤气上终，始复降下居初者也。”讲《象》《大壮》：“刚以动，故壮。”曰：“乾刚震动，阳从下升，阳气大动，故壮也。”等等，皆其例。

他又以阴阳二气交感解释卦爻的变化。如他讲《文言》《坤》：“至静而德方。”曰：“坤性至静，得阳而动，布于四方也。”并在解释《系辞》之“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时，说：“谓阴升之阳则成天之文也，阳降之阴则成地之理也。‘幽’，谓天上地下不可得见者也。谓《否》卦变成《未济》也，‘明’，天地之间，万物成列，著于耳目者，谓

《泰》卦变成《既济》也。”

他认为象征阴阳的《乾》《坤》两个卦体，是代表天地生成万物的根源。如他注《彖》《坤》：“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曰：“《乾》二居《坤》五为‘含’，《坤》五居《乾》二为‘宏’。《坤》初居《乾》四为‘光’，《乾》四居《坤》初为‘大’也。天地交，万物生，故‘咸亨’。”这样，《乾》《坤》二卦既然代表“天地交，万物生”，所以，在荀爽心目中，“坎”“离”“艮”“震”“兑”“巽”这六个经卦亦由《乾》《坤》二卦生成。如他注《文言》《乾》之“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曰：“阳动之《坤》而为坎，《坤》者，纯阴，故曰‘湿’也。阴动之《乾》而为离，《乾》者，纯阳，故曰‘燥’也。‘龙’喻王者，谓《乾》二之《坤》五为“坎”也。‘虎’喻国君，谓《坤》五之《乾》二为离而从三也。”接着，讲“与日月合其明”曰：“谓《坤》五之《乾》二成离，离为日，《乾》二之《坤》五为坎，坎为月。”这就是说，他认为经卦“离”是由于《乾》卦内卦九二爻与《坤》卦六五爻互换而生成。经卦“坎”是由于《坤》卦外卦六五爻与《乾》卦九二爻互换而生成。其他经卦亦同，如他注《彖》《解》之“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曰：“《乾》《坤》交通而成《解》卦，坎下震上故雷雨作也。”显然亦以“坎”“震”是由“《乾》《坤》交通而出。（以上所引，皆见《周易集解》）

荀氏这种以阴阳“升”“降”交通解《易》的方法，给了后人以重大影响，如王弼注《泰》卦六四爻：“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曰：“乾乐上复，坤乐下复。”显然取于荀氏之说。但王弼偏不说“升”“降”而用“上复”“下复”来代替，表示自己不取汉人象数之说。

人们正是根据荀氏有关阴阳“升”“降”交通及《乾》《坤》生其余六经卦的思想，认为他是古人最早谈卦变者，关于他的卦变思想，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此处即不叙述了。

最后我们介绍虞翻。

虞翻，字仲翔，也是东汉末年人，五世家传孟喜《易》学。曾作《周易注》，《释文叙录》说十卷，《隋书·经籍志》称九卷。此人气节很高，不信神仙之事。有一次孙权与张昭谈论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

我们以为虞氏《易》最具特色的是其“纳甲”说与卦变说。

所谓“纳甲”说，是以月亮之晦朔盈亏以象八卦，再纳以天干，以此显示八卦消息，使其“不失其时，如月行天”（《周易集解》之《坎》卦虞注）。如他注《系辞》：“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说：“谓日月悬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则离，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据此，朱震在其《周易卦图说》称：“纳甲何也？举甲以该十日也，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巽纳庚辛，坎离纳戊己，艮兑纳丙丁，皆自下生，圣人仰观日月之运，配之以坎离之象，而八卦十日之义著矣！”

很清楚，此法系以十干分纳于八卦，而举十干之首“甲”以概其余，故名“纳甲”。根据以上虞氏注文，“八卦”符号为：震示初三月象，兑示初八上弦。乾示十五满月，巽示十七日月由圆而缺。艮示二十三日下弦，坤示三十日月晦。以此显示八卦的阴阳“消”“息”。

“纳甲”法据说京房所作，然而孟喜注《中孚》卦六四爻之“月既望”，已谓：“十六日也。”（张惠言《易义别录》卷一）可证其源较古。此说是否整理先秦时代人们以天体运行，阴阳消息释《易》的遗说而成？案《彖》《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其以